

今日評論

第五卷 第二期

這一週

說工讀兼營

我對「爐旁播講」的觀感

美國外交的新動態

黨治與法治

日本的南進

潘光旦

張忠絳

王贛愚

樓邦彥

錢端升

民國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這一週

巴爾干的隱憂。本報上期集稿時，尚未見詳報章。惟本報嘗言其將陷，且德及俄亦將涉焉。本月五日，巴第亞果真陷落。不但如此，巴第亞西面的多布魯克亦岌岌可危，早不保夕。巴第亞是利比亞的重鎮，位居利比亞的東北。爲義軍威脅埃及及蘇彝士運河的根據地。義人自佔阿比西尼亞後，經多年的經營，始有此重鎮。乃今竟爲英澳軍隊所攻克。怪不得齊亞諾之流要垂頭喪氣，從自勉警戒之辭中，愈足以見其懷衷之甚。至於英國方面之歡欣鼓舞，邱吉爾之賀澳政府，埃及國王之賀英政府，也是理所當然。最可爲義人悲約，是軍無鬥志。當英方包圍巴第亞時，義政府及義帥格拉齊亞尼曾多次嚴令巴第亞的戍軍只准死守，不准投降，格拉齊亞尼自己且正率軍赴援。乃戍軍竟可投降，而不顧死戰。此誠是義大利所應痛心者。最可爲英人賀的，則是帝國力量的見效。此次利比亞的戰役中，主力軍爲澳軍。此後海外軍跟源源開戰非作戰，英方實力自可大增。英人又安能不喜？如果近來義方日夜建造的多布魯克要塞也隨巴第亞落於英人之手，則義之悲與英之喜更可知矣。

義大利的失敗不限於北非。在阿爾巴尼亞，義軍仍在敗潰中。近日報傳義軍三萬餘人將自凡羅那登輪撤退。凡羅那爲阿爾巴尼亞第二要港，如凡羅那亦在放棄之列，則義軍之在阿爾巴尼亞者，勢將無立足之地。一月來形勢，希軍自阿境北部及沿海一帶步步進逼。班篤斯高地的佔領，使義軍墮居高凌下之勢。如要港再落義軍之手，則阿爾巴尼亞不久將非義之所有。北非失敗，阿爾巴尼亞又丟落，墨索里尼其尙有何種面目見人乎！

德軍之已控制羅馬尼亞的全境，可於羅馬政府制裁德軍團之舉視之。德軍團是羅馬尼亞的納粹黨，而首相安東尼斯哥則非德黨國人，如納方不發維持

序之令，則阿爾巴尼亞對德軍團人雖有甚可憂何之苦。但德軍既已切實控制羅馬尼亞，則羅馬治安亦有利於德之事。近日羅馬政府正大捕德黨團人，足徵在實際上羅馬尼亞已成了第三帝國的一部分。

保加利亞對德情形仍甚混沌。旬日報紙雖傳德軍開入保國，或德將和平佔領保國云，但德軍是否已入保境，仍無從確知。保國是沒有加入軸心的國家。其對德，與保國不同。所以然，則因蘇聯與土耳其兩大隣國俱望保國嚴守中立，以資緩衝。蘇聯與土耳其既望保守中立，則德決不能強迫其加入保境。德軍入保境不啻是強土耳其加入英方作戰，也不啻迫蘇聯採取嚴厲戒備。德如無在巴爾幹引起大規模戰爭的決心，恐一時尙不至遣大軍進入保國。

羅馬尼亞總統本月六日致國會咨文，其要調與去年底的一爐爐話。一。致而呼籲。其謂「據德開話」的真意義，本期張忠誠先生另有長文詳及。簡言之，其用意在於策動全國人民，以最大可能的經濟力量，打倒德後日三敵人。而避免我國人民的流血。本月六日的咨文則指明了將用何種方法，以達到此種經濟的目的。羅馬總統所要求者，即國會應統以增加生產，並自由援助中產及一切應予援助的民主國家的全權。這裏所謂民主國家，即是抵抗德意目的國家。如總統欲得其所要求之權，則他此後可以不管中立法如何規定，也不管德法如何限制，可以考慮需要，自由以美國的軍用品，其他貨物，若其對德飛機，借給友邦。唯一的限制，就是對德可以以軍事反對，並取消總統的行爲。但事後的反對向來是不甚有效的。羅馬總統以除貸方式，贈予英國飛機一千。這便消息發表的當日，飛機已全數運英。此後國會儘可決議反對，但德意者已因在戰前而減。是以，事後以反對在實際上

，很難約束總統的大權。怪不得國會中的孤立派，如參議員克拉克及拉福勒等，要大聲指摘，大受反對。但羅斯福既在兩院擁有多數，而美國實業界也主張以經濟方式助英抗德，則國會必可通過總統建議的主要局分。通過後，主要的援助自將去矣。但我政府如能對如何可以求助於英這件事妥為計劃，則我國當然也可以獲得遠比一萬萬美元鉅大的助力。

美國目下的打算固希望不費一兵一卒，勝德義日，但也無日不在備戰之中。海軍的改組即為實現兩洋政策的先聲。經此次改組後，艦隊之數將有三個，一為大西洋艦隊，一為太平洋艦隊，又一為亞洲艦隊。太平洋艦隊的司令為全軍的總司令。此主要艦隊則以夏威夷為根據地，東過巴拿馬運河可為大西洋艦隊的聲援，西航太平洋，可領導亞洲艦隊與敵人作戰。美國此時因急於整頓，固無意引起日美之戰，其未固自行取得新式戰艦，用意殆亦在不激怒日本。但美國對日之不甘苟有退縮，亦頗可於海軍改組中窺見之。如日人不自其度，而強美國以作戰，則美必不辭戰矣。

日蘇漁約，一年一度，也一年一緊張。於此也可見日本國際地位的低下。日蘇關於樺太島附近及柏林海中的漁業協定，從前本根據於樸資茅斯條約，於日方頗為有利。自一九三八年年底滿期後，日人希望重訂有利的永久條約。但蘇方未允。當一九三八年及三九年之交，兩國國交幾頗破裂。最後蘇方固仍允結條約，但所結者為一年為期的臨時協定，且日方所得捕魚的區域及漁獲便利亦多方限制。此臨時協定已經展期一次，亦以一年為期。目下，展期者又滿期。在日人心中，最好是訂一永久條約。不獲，則再將舊約展期一年。前此時，日方本盛傳，去年歲杪，可成立一個新的協定，但屆時亦未成功。漁約本於兩方皆有利，但蘇方竟如此留難，則深見日本國力微弱，故主動之權操於蘇，又可見日蘇利害甚有衝突，故縱有希特勒從中調和，

而仍無法調和。

泰越之開通來交戰愈烈。雖兩國均不認已入交戰狀態，而越方更極力表示願和，但劍拔弩張，其疆土之爭恐永無和平解決的可能。泰國之爭疆土本有相當理由，但其行為頗有受日操縱之嫌。泰日友好協定更有類軸心協定。但泰政府最近尚表示泰英間關係極為友善。美國亦向為泰之益友。即如此，何以不由英美中三國聯合向泰越調和？幸而成，則固南亞各民族之福。不幸而敗，亦可以發露泰越兩國的政治背景，與中英美無傷。我外交當局其能予此事以有勇氣的考慮乎？

英對新加坡將增派飛機二百架，其統帥布洛克波普翰亦僕僕道途，不遑再處。馬來與荷印在軍事上早通聲氣。荷印實力近來頗充極速，陸軍已自八萬增至二十萬，潛艇已自二十增至四十許。如果馬來及荷印實力如此銳增，再加以華島美國軍力的增厚，則日本南進的難運，益顯明矣。

十一日雲南日報論說，政府日將成立糧食物工執行總局，以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及賀耀組將軍為正副主任，以社會部部長谷正綱為總幹事。總局的權力將遍及於糧食及其他物資及工價的管理。如果此說不虛，則此新設機關將為與人民生活最密切相關的國家機關。這樣一個機關必須成功。如果失敗，則此後數年內其他管理糧食物工的嘗試也不易成功。然而糧食管理與物價統制等俱是又難又易的工作。如果社會有組織，統計及調查可靠，行政者廉潔公允，則管理的工作極易。德國多年來的經驗是一證。如果社會無組織，統計及調查或無有或不可靠，行政者又不廉潔公允，則管理工作極難。年來我國之外匯管理可為一證。我們甚願政府先作管理的準備，然後再嚴厲執行管理。但如已經設局，則我們唯有希望執行者的廉潔及公允已無問題。

說工讀兼營

潘光旦

——大學變通論之一——

抗戰開始以來，最高的教育當局和主持各大學的人所最感痛苦的一點是，總想在還非常的一般局面之內維持原有的與一向認為正當的大學機構。大學的數目至今是一樣的，說不定還多了幾個，舊的有取消的，或暫時停辦的，但同時也有新的添置。播遷到內地的學校，雖在流離顛沛之中，院系的組織，學程的開設，師生的數量，圖書儀器的設備，學分與學年的限制，必修選修的配合，上課，請假，休學等等的規則……一切以前所有的如今都完全依樣的有，即使事實上有所不到的，表面上也不能沒有。這種努力，這種知其不可而為的努力是值得讚美的。我們的教育政策似乎和外交政策很有幾分相像，就是，同樣的採取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

不過這種努力也可以引起兩個批評。第一個批評是主持大學教育的人似乎存着一種心理，抗戰不久就要過去，勝利不久就要到來，這是一個過渡的時期，或者可以說是一個蛰伏的時期，是易卦明夷所代表的一個時期，在這時期內我們只有隱忍，只能維持原狀，只能勉力支撐一個已有的格局，只能儘些抱殘守闕，補苴罅漏的工作。這心理是值得批評的。抗戰是總要過去的，勝利是總要到來的，但三五年以至於十年八年是誰也說不定的，如此支撐下去，雖使大費心力，行見殘闕越來越多，罅漏越來越大，安知前途沒有一天，抗戰還未成過去，而殘闕罅漏已經多到一個無法彌補的境界呢？

第二個批評是和第一個的性質相仿的，不過更見得深刻一些。上文所說隱忍或苟安的心理據說是有民族性的根據的。據說我們的民族，因為災荒的經驗特別多，已經養成一種性格，此種性格的效用，教我們對於四周的環境，只能消極的應付，而不容易積極的制勝。我們目前抗戰的軍事，可以說是很多積極的了，但我們的大學教育似乎終於不免掉進了消極應付的窠臼。以

前次人作進一步的論陷，我們的大學就作進一步的向內地遷避，有的大學避到四五次以上，這固然也是一種消極的應付，但這是我們不能責備的；敵人空襲的來到，大家的師生全都向郊外疏散，空襲解除，又全部回來，照常工作，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這也是消極的應付，但這也是不應當責備的；因為要在這些地方化消極為積極，不是教育行政範圍的事。教育行政至多只能減少消極的程度，例如學校遷避應作比較的一勞永逸之計，不要一面再，再而三的老是彷彿在旅途之上，又如空襲疏散的時候，學校可以叮囑學生，要力持鎮靜，勿過事張皇等等。不過有的消極的應付與此種應付所引起的苦悶是可以避免的，例如，物價一天比一天高漲，調平物價的力量不在教育當局與學校當局的手裏，但就能力所及而論，難道除了津貼、米貼、貸金、救濟金，以及其它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方法以外，更找不到比較積極的、持久的制勝應付的辦法？又如民族文化裏缺少科學，國家人才裏缺乏技術的人才，理工各科的充實確屬目前當務之急，毫無疑問的，充實之法不外多設理工院系，鼓勵青年選擇理工各科做專業，和增加理工各科的儀器與圖書設備等途徑，而若干途徑之中以設備的充實最關重要。這一方面的設備是要向國外採購的，採購需要外匯，又需要交通路線，這兩點又不是教育當局所能自由支配，使外匯一日不利於我，外國交通的路線一日不能暢達，難道我們這部分的教育工作就得長此停頓不成？就目前論，我們在這方面的積極的努力似乎是已經停止了，我們目前所正在做的，似乎只是鼓勵青年加入理工科的一項消極提倡的工作，而即就此種只重格式不重內容的提倡功夫而論，又不免失諸輕理重工，根本忽略了工從理出的那一點。好像只要一經提倡，技術人才就會產生似的。此種努力的苟安將就，舍本逐末，避重就輕，和用錢的方法來解決學生的營養問題，豈不是如出一轍？

本黨要說的話，一方面假定抗戰短期內不會結束，假如短期內可以輕易結束的話，那結果對我們一定是弊多利少；唯一一時不會結束，我們也不希望它結束，我們在教育的設施上，好比其它方面的設施一樣，必須有一些更進一步的積極的應變的辦法；一方面也假定，即使抗戰結束，而建國的工作正式發軔，我們在抗戰期內所實施的變通的辦法依然可以沿用，依然不背於平常教育的原則。但茲事體大，決非一二人的思慮所該周備，姑就管見所及，提出四個寬大的原則來，一是工讀兼營；二是訓教合一；三是通專並重；四是理實分途。至於這些原則的是否完全合乎事理，應該如何實施，實施時應的細目如何，當有待於專家的從長計議。本篇姑先就第一個原則說一說。

工讀兼營的原則有人說事實上等於教養兼施的原則，而教養兼施的原則是目前的教育當局已經在實行的。抗戰以前，學校教育只管教，而不管營；抗戰開始以來，清寒子弟激增，於是貸金、救濟金、伙食補助、零用津貼等等的辦法便應運而生；最近更有人就青年營養的問題，或發為呼籲的文字，或從事於營養化學的專題研究等等；足見主持教育的人於教育而外，事實上已經兼顧到養。這見解是似是而非的。真正的教養兼施是應當取工讀兼顧或手腦並用的方式的；工讀的工所生產的養是自動的養，而目前所謂教養兼施的養是被動的養；自動與被動之間，實在有很大道德的分別。目前所謂的養是等於救濟，名目上也很不客氣的是救濟；青年對於受公家救濟的態度，可以說有三種，大多數是家境確屬清寒而以受救濟為無愧的，一小部分是還不清寒而不以受救濟為有愧的，更有一小部分雖屬清寒而是不屑於受救濟的。對第一種青年，救濟金一類的辦法可以培養依賴與不勞而獲的心理，對第二種青年更足以助長貪讀的習慣，對第三種青年則不免摧毀其自尊獨立的傲氣；都是很健全的，都違反了正當的教育原則。

工讀的養是自動的。工讀兼營的原則本有許多好處，職業教育運動的一批朋友提倡手腦並用的教育已有多年，認為只有這種教育才可以打破以前讀

書人專觀勞作的陋習，少數熱心於教育試驗的人也作過零星的提倡；例如上海而立達學園。工讀自有其很大的教育的效能，我們是不懷疑的；不還等今日，我們更不妨承認工讀的經濟的結果，而設法充分的與普遍的利用此種結果，特別是因為比起救濟的政策來，這種結果要富有道德的涵義的緣故。

就事實論，目前實行工讀的青年已經不在少數。大學生之中，完全靠家庭接濟與公私補助的人比從前少了許多。有的在不妨礙課業的條件之下，在學校內外覓取短時間的工作；有的取得了學校的同意，得酌量少選學分，而在學校附近覓取比較長期而有薪給的工作；有的更進一步的向學校申請休學，在外就業一二年之後，再以儲蓄所得繼續攻讀的挹注。他們工作的種類也是不一而足，大抵除了高深的專門職業而外，目前我們都可找到大學畢業生的蹤跡。工讀兼營在目前已經不止是一個原則，而是一個事實，目前所缺的是組織，是合理的提調，是教育當局的承認而引為積極的政策的一部分罷了。

我主張工讀兼營應該成為高等教育以至於中等教育的政策的一部分，並且認為特別應該注重生產的工作，例如園藝、畜牧之類。大學年限之內，應該劃出一部分的時間，說是最初的兩年罷，作為半工半讀之用，或上半日工讀，下半日讀，或每日每一學生應至少工作若干小時。其因形勢困難或工作興趣特別濃厚而願意一面多做工作，一面延長求學年限的，也不妨設法加以容納。

工讀引起一些連帶的問題。年限的問題就是一個。一向最少應讀滿幾年的限制，當然不能沒有，但可以延展至幾年，或中間可以停頓幾年，便大可不必限制；以前休學不得過二年的規定便可以取消，只要一個人有志力繼續學業，又何必因年齡的緣故，加以阻撓？又一個是學分的問題。一個人最多應選習若干學分，當然要有規定，但最少的數目便可以不必限制。一個有志的青年，因為同時要養家庭，願意對於大學教育的完成，作一個七年或八年的計劃，我找不到甚麼重大的理由來勸阻他。假定大學的前期將採取

一個一律的半工半讀的辦法，大學教育最少的年限，以及每年最多的學分等問題，事實上便須根本加以通盤的考慮。

工讀所引起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學校的環境，特別要是所做的工作是屬於生產一類而勢須學校當局加以通盤籌劃而引為行政的一部分的話。這樣的工作需要一個農村或半農村的環境，需要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面積，無論作農業生產的園地，或工業生產的廠房，比較大量的地畝是不可少的。大學的環境，就通常的情勢論，本來是鄉村優於都市，郊鄉優於城區，在抗戰的今日與建國的將來，這種比較似乎更見得顯然。

在抗戰進行的前期裏，大學以城市做環境是有相當的意義的。抗戰期間後方生活的緊張狀態或此種狀態的缺乏，以及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變遷，都是值得觀察的。敵人對於城市的空襲，在這時期裏也無須乎過於安全的躲避的計畫，因為空襲的身經自觀，在不損失個人生命的有限條件之下，就是工讀教育，也許是今後教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不過抗戰已經進入相當穩定的段落以後，城市環境的價值就減少了。一則後方的社會生活也漸趨於穩定，成為一種戰時的正常狀態，實地觀察的需要也減少了。再則敵人空襲的頻數增加以後，臨時疏散的需要自然加大，此種情形雖並不能減少我們的膽量，摧毀我們的志氣，但有一層是不能避免的，就是心理上的厭倦。厭倦的心理是可以妨礙學業的進行的。為避免這種心理計，也為圖書儀器一類的設備得以繼續出來而充分的利用計，一個比較久遠的疏散的辦法，或轉移入鄉村或山野環境的辦法，還是有它的地位。

就大學教育對於建國的必要設想，鄉村或山野環境的優於都市環境，更要見得明顯。中國人口的十之七八是鄉村人口；無論工業經濟前途會發展到甚麼程度，農業經濟總是民族經濟最基本的部分。不為別的，即為了和這十分之七八的人口發生聯繫，為了對民族的基本經濟可以有些直接與不經轉手的認識，大學青年應當拿鄉村做他的教育環境。鄉村與都市的文野程度原不能一樣，但在中國，這差別太大了，這種不應有的大差別是要教二三十年

來的大學教育負責的。大學的所在地，既十之八九為大都市，而大學教學的內容，又幾乎全部準備只教青年做城裏人，而不做鄉下人；於是成千成萬從鄉間吸引出來的青年就算是和鄉村絕了緣；近年來鄉村文明程度的特別見得落伍，這實在是最大的原因了。所以為鄉村培植人才與保留元氣着想，大學也應該選擇鄉村或山野的區域做它的環境。

最後可以說到工讀兼營中工作的性質了。上文提過這種工作應當是生產的，即有狹義的經濟的效用的。這種生產的工作又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一般的，即無論與前途的專業有無關係，凡屬大學生，或凡屬低年級的大學生，都應當參加；二是特殊的，即是與專業的準備有些關係的。理工科的學生可加入學校附設的工廠作工，或製造，或修理；法商科的學生可以管理合作社等等，可以說屬於這特殊的一類。但我以為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是一般的一類，而這一類工作的性質是側重於農業方面的。我們若不主張工讀兼營則已，否則農業工作的結論是無可避免的。一則一樣分配工作，只有這種工作最可以作普遍與平均的分配；再則根據上文鄉村或山野環境之論，可知在這樣一個環境裏，最合適的工作自然是圍圍藝畜牧等範圍以內的；三則唯有這種勞作才可以教育青年對於民族的本經濟，可以有一個親切的了解。當然農事勞作的優點還不止這幾點。這種勞作最合於個人衛生，若是鐘錶不太多，並且根本可以看作一種遊戲或改換作業空氣的安排。最後，我們不要忘記，這種勞作的生產力是最直接的，最可以取得近功的。在目前的情勢之下，在資金救濟的局面之內，每一大學生吃兩碗白飯，也許一時還不成問題，但菜蔬早就不敷分配，肉類的供給可以不必說；今後的大學生再想多吃幾塊肥肉，怕除了實行工讀，實行兼事農事勞作以外，沒有第二條路。

對於工讀兼營的主張我們發見至少有兩個可能的質難。一是國家需才孔亟，工讀兼營的結果不免延長大學畢業的年限，因而屢緩人才的產生與供給。這質難是不容易成立的。我們承認國家舉辦大學生貸金與救濟金之類，原有這種苦心孤詣存乎其間。但救濟不是辦法，上文已經說過，即便是一個辦

法，即使在經濟的立場上完全站得住，試問十數元的法幣，又能有多大的貢獻，這區區之數能維持殘喘，則有之，要提高營養，則相去尚遠。然則國家能「做好事做到底」或所謂「送佛送到西天」麼？事實上怕又不可能。既不可能，則大學畢業的年限，平均不免從四年展到五年六年，也是無可如何之事。自從有先修班的辦法以來，這年限不已經展到至少五年了麼？

還有一實難處，大學教育是很崇高的，他的目的在教人做人，教人消受中外古今一切文化的精華而加以增進，如今主張工讀兼營，豈不是與請學為老農老圃的樊遲犯了同樣的毛病？這實難也是似是而非的。試問目前大學裏職業準備的成分還少麼？不少，在一般人的眼光裏，大學根本是職業訓練的「二個場合」，並且還抱憾它訓練得不充分，以致大學出身的人不容易找出路！我們人平時對於大學的看法，也贊成陳義不妨較高，因為，求乎其上，僅得其中；我一向並且不贊成專為職業而教育，教育的結果，做人原是第一，吃飯本領應是餘事。但從教育與身心鍛鍊的立場，適當的勞作是有很大的價值

我對「爐旁播講」的觀感

——表示了羅斯福總統「外交新政」的動態——

「爐旁播講」是羅斯福總統就任後所採取對美國民眾宣布政見的一種辦法。英文原名叫 Fireside chat，由羅斯福先生坐在白宮內，火爐旁，經由廣播機向美國民眾播講。Chat 一字本可譯為「閑話」，但其中包含有「談心」或「親密談話」的意思。Fireside chat 既已成為一種制度，如上所云；這種制度我們似不宜稱他為「爐邊閑話」。大凡一種閑話，都含有可談可不談的性質，而且含有一談笑」的性質。我們若稱羅斯福的爐旁播講為「爐邊閑話」，既與這種制度的原意不符，而且減輕了講詞的尊嚴。美國大總統宣佈政見，我們決不能說那是可談可不談的，我們更不能說那帶有「爐邊」的性質。最好的譯文，似應為「爐旁談心」。這裏面包含有親密

的，這一層誰也不能否認，主張工讀兼營的人無疑的應從這一層出發，作他的基本的立場，勞作的結果而能有助於生產，能於生活的營養，有所裨益，那也是值得歡迎的一個副產品。工讀教育不至於妨礙做人與通識的教育，以後別有討論。

時至今日，大學的生活勢非加以變通不可了。工讀兼營便是變通的一個方向。西洋天主教寺院裏的學者往往兼營農業，劃時代的孟特爾遺傳法則就是這樣一個和向學者的貢獻。中國民族也原有耕讀並行的理想，這理想是很健全的，民族不少的元氣，就是經過個理想保全下來的。假若我們一面想呼應與實行這民族原有的理想，一面又承認適當的勞作，特別是在教育青年時期，對青年有很大的教育的價值，還有第三面，即對目前抗戰的環境與需要，具體力與腦力，自求多福，為甚麼不把工讀兼營的原則，有規模的實驗一

張忠誠

的意思。然而仍嫌不夠莊重。無已，我將他譯成爲「爐旁播講」；這種譯法雖仍不完滿，但尚切合事實。

自從一九三七年中日戰事爆發，世界局勢嚴重以後，羅斯福總統會於該年十月中旬有一次「爐旁播講」。這是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以後，羅斯福總統第一次的「爐旁播講」。以那次播講的內容與這次播講的內容相較，其措詞的強弱，簡直不可以道里計。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美國國內孤立與中立的思想愈趨濃厚，國民對於芝加哥演說（十月五日）的反響并不見佳，是以羅斯福總統不得不放棄「隔離」的字樣，而採取調解的語氣。

在這次的播講（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羅斯福總統公開表示：「我可以適當的并且絕對的說，美國沒有鼓勵任何商談和平的權利或理由

……」。羅斯福此語雖含有答復運動等孤立派的用意，但其詞句的堅決，已足以反證美國輿論的進步。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孤立派的意見可以代表一大部份的民衆；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孤立派的意見所能代表的民衆，已爲數有限。在一九三七年十月，美國的民衆大部分畏懼戰爭，不願意捲入戰爭的漩渦，唯恐「惹火燒身」；在一九四〇年年底，美國民衆大部份已不復畏懼戰爭，雖無意挑戰，但已決不怕「應戰」。在一九三七年十月，美國民衆尚未感覺，侵略國家對於美國本身的威脅；當日的先知先覺者，也不過認爲，美國所受的影響，只是海外權利的損失，美國經濟的波動，以及條約尊嚴與世界合法秩序所遭遇的打擊。在一九四〇年年底，不僅止美國的先知先覺者，就是美國的一般民衆，業已感覺美國本身所受的嚴重威脅，而此種威脅已不僅限於經濟方面，且已包括政治與軍事方面。是在此次播講中，羅斯福總統說：「坦白的并且決定的說，危險已在吾人的前面，吾人必須準備應付。」

羅斯福總統本是美國有先見之明的大政治家；他這次的播講，一面反證美國輿論的進步，同時也負着領導輿論的責任。故此他特別提出八年前的經濟危機，并重申他當日的態度，以與現時的國際政治危機相比擬。這暗示了，一九四一年將爲羅斯福總統在外交上開始實施「新政」的一年。在過去，美國雖會同情并援助民主國家，但那種援助，我們只能叫他爲「同情的援助」。因德國對丹、挪、荷、比，法等國攻擊的成功，美國輿論的轉變（在一九四〇年春夏之交），德義日三國同盟的成立，以及羅斯福總統的三度被選，美國對中英兩國的援助，已漸轉爲「自救的援助」。在遠東，美國一向未曾中立；對歐洲，自羅斯福總統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的演說發表後，美國在精神上亦已放棄中立。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後，年底以前，美國對中英兩國的援助，業已表示出一「自救的援助」的精神；其例證甚多，勿庸一一列舉。隨着「一九四一年」的開始，隨着羅斯福先生就任第三十四屆總統的宣誓，美國對中英兩國均援助與在外交上的行動，必將增強。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播講，在

指示此種行動的傾向。

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爐旁播講」中，羅斯福總統對於他來年的一「外交新政」，已闡明了主要的動態：（一）對於暴力，無可妥協，因此「美國沒有鼓勵商談和平的權利或理由」。 （二）歐亞兩洲之戰爭，與吾人（美國）有生存攸關之關係，因美國決不能聽任歐亞兩洲的戰爭禍首控制通達西半球的海洋。 （三）美國應迅速而有效的重整軍備，并必需成爲「民主國家的偉大兵工廠」。

根據上述的啓示，我們可以認定，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一年開始實施「外交新政」後，必將採取下列的步驟：（一）大量增強美國軍需的生產，並迅速完成美國國防的準備；（二）竭盡一切的可能（包括財政，飛機，船隻等等）以援助民主國家；（三）完全掃除中立的幻想，并準備「應戰」。

在此次「爐旁播講」中，羅斯福總統雖會重行聲明，美國決不派遣士兵至歐洲作戰的諾言，但同時會保證加強對英戰爭以外的援助。在英國海軍仍能控制北海海峽與大西洋的期中，美國實無派遣士兵至歐洲作戰的必要。而且自法國屈服以後，歐陸上已無戰場。羅斯福總統所準備給予英國的補助，也正是英國現時所最需要的援助。羅斯福總統向美國人民所保證的，不給予英國的援助，英國現時並不需要。故此我認爲，羅斯福的「外交新政」若能付諸實施（我認爲必能付諸實施，雖難免孤立派的反對），則在事實上，美國已不啻完全放棄中立。且觀羅斯福通篇演說的語氣，美政府實亦無意中立。蓋羅斯福總統對於現實的國際狀況，早已有深刻的認識。

專就遠東而論，在這次的「爐旁播講」中，羅斯福先生所用的詞句與語氣，也較以前的任何聲明與談話，堅定而強烈。日本爲一暴力，自亦無可妥協。亞洲的戰爭與歐洲的戰爭相同，都與美國有生存攸關的關係。美國不能聽任亞洲的侵略國家控制太平洋。中國爲民主國家之一，而美國將成爲「民主國家的偉大兵工廠」。此外，美總統已將日本與軸心國家併爲一談，并已公開承認，中國與英美兩國的命運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他說：「在現時，聯

更以攻守一詞，自由中生活之人民的那些國家的武力，現正被阻隔於我們的海岸以外。……日本人現正被中國人在另一偉大的防衛戰中，牽制於亞洲。

根據上述，在羅斯福先生的「外交新政」實施以後，我們可以斷定，美國對我們的援助，特由貸款，而擴展到軍需品的供給；將由禁止出口而擴展到統制入口。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美國對遠東，素來並未中立。在此以後，美國對中日間的戰爭，實無中立的可能。

此外，尚有一事，極值吾人注意。羅斯福先生曾屢次表示，美國不願參戰，但他始終只允諾了兩點：（一）美國決不派遣士兵至歐洲作戰；（二）美國企望和平。他並沒有說，美國除不派遣士兵至歐洲作戰以外，且決不將艦艦、運輸船隻、飛機，甚至於飛機與軍艦的駕駛員往歐洲，援助英國。當然，上述的第四項現時受有中立法法的限制，但這些駕駛員可以退出美國政府服役，而自動投效英國。中立法若能被修正，則此種限制自將隨之消失。他也並沒有說，美國除企望和平外，且亦決不對外作戰。他所允諾的，只是「企望」和平而已。至於關係遠東方面，他根本沒有作任何承諾。他所允諾的兩點，一向是對歐洲的問題而發。最多，我們也只能說，他在遠東也同樣的「企望」和平而已。拿這番言談，去看他此次「爐邊播講」中的「太平洋

美國外交的新動態

——授英與國——

本月六日羅斯福總統，向美國國會宣讀咨文，對今後的外交方針，有坦率的闡述。這一篇演說的意思，與去年年底的「爐邊開話」，同是表示援助反侵略國家的決心。羅氏在這兩項動人的言論裏，首先促使美國人士認清嚴重的危險；再進而指出擴張姑息政策的重要性；基於上述的論據，最後主張傾全力，以援助英法的心意，務使美國成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美國對於中英兩

洋上，現有吾人之艦隊」一語，其意義的嚴重，尤爲顯明。

英國在歐洲是主要的大海軍國，其海軍實力現時仍足以控制大西洋面。無怪乎羅斯福先生說：「當不自由的英國仍爲吾人在大西洋上強大的海軍隣邦時，有人真相信吾人有恐懼攻擊之必要乎？反之，假若軸心國家爲吾人在大西洋上之鄰邦，有人真相信吾人果能安居乎？」是以在事實上，美國現時并無自動參加歐戰的必要，只需以物力財力援助英國，并支持英國艦隊控制大西洋面的實力。在遠東，中國不是海軍國家，中國只能將日本「牽制於亞洲」，而不能完全阻止日本南進。是以美國之艦隊必須留駐太平洋上，而羅斯福在此次播講中，特別予以表明，其含意深遠，不問可知。

羅斯福總統既已認定，日本與軸心國之目的，在「統治並奴役人類」，美國決不能令「歐亞之戰爭禍首控制通至西半球之海洋」，是一九四一年羅斯福行將實施之「外交新政」必將依據此種認識與原則而努力也。羅斯福總統之預料侵略國家必將失敗，美國今後之努力，當爲其重要根據之一。

在本文完稿以後，我們又已看到，各通訊社關於羅斯福總統正月六日對國會致詞的簡略報告。致詞的內容，與上述「爐邊播講」的內容，無大差別。這兩篇演說內容是美國今後外交的南針；羅斯福總統的「外交新政」，已自茲開始。

正月八日於重慶

王曠愚

隨的抗戰，自始所予的同情援助，現在已變成了自救的舉措，所以縱然侵略者認爲這種舉措有違背國際公法，或強目爲戰爭行爲，美國亦將不爲其威脅所懾，而趨於停止助英援華之一途。英明果斷的羅斯福總統，過去因受中立法之牽掣，在外交上不敢放胆支持正義，卒使侵略者無所戒心。現在情形則大異了；羅氏爲應付空前的國際危機，已獲得便宜行事之權，不願再受片面的國際公法的束縛。自今以後，美國在歐亞兩洲，參戰與否純是事實的問題，而

非理論的困難；我們可以斷言的最少是助或援手的程度，不必因需要參戰，而後始能增進。

美國循現有政策以進行外交，其日益走向戰爭是必然的。羅總統在競選時期，雖曾保證不使本國捲入戰禍，但誰都預知其獲選之後，美國參戰的可能性却要增加。羅氏所能保證的，不外是以一切可能之努力，遏制戰爭之發生，及戰爭發生以後，竭力阻止其範圍之擴大。我們固相信羅氏必將實踐此項諾言，但倘若其必將把避戰為固定的政策，則我們不能不無疑。反侵略已成為美人的一致態度。朝野人士深知與軸心絕無妥協的可能，所以呼籲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雖然最近大選的結果，未引起外交政策的轉變，但以反侵略最力的羅斯福，繼續主持外交，必使美國離開孤立主義日益遙遠。近日美國外交的動感，實足證明這一點。

美國享受長期的孤立，純是國際情勢之賜，而華盛頓總統的箴訓，絕不能永遠決定美國外交的走向。其實，美國開始採行孤立政策，却在華氏去世二十餘年之後。所謂門羅主義，自宣佈以至上次歐戰，認真施行尚不及九十年；況且在近九十年時期中，歐洲並沒有過大規模的戰爭，可使美國無從置身局外，因為當時美國海上霸權是未受搖撼的。一九一四以後，爭霸之戰，層出不窮，實際上無一次不牽涉及美國，這種情形與一八一四年以前相似。這次歐戰爆發後，美國之難保持中立，自始即有事實作爲佐證。美國在當時的環境中，已不能專恃天然的形勢以自保持，倘使歐戰擴大下去，就是大西洋也會變成軸心侵入的一條大道。以海洋爲禦敵的防線，首須積極建立「大海軍」，不然，則不足以應付外來的威脅。就大西洋方面言，過去美國還很自如的優勢，顯然是建築英國海權上面的。由英海軍所促成的歐洲均勢，使美國百年來避免了不少外患。致在各方面得以自由發展。美國海權不啻是美國安全的屏障，這項屏障雖存在已久，而美國至今才了解其真正的功用，這是國際現勢使之然的。現在英國正從事抗德義之戰，尤其自法國屈膝求和之後，其所恃的最後武器，就是強大的海軍，及其與海軍相配合的陸軍。

就實情上言，英國在大西洋上海權之保持，既與美國安全關係甚切，尙爲特勤所推測。美國所受之威脅，將不亞於英國。爲了這個緣故，美國此際不論爲己爲人，總須採用各項具體辦法，以維持英海軍之固有力。協助英艦，使其保持海上霸權，對美國擴軍，確有很大的幫助；因爲美國正在爭取時間，以充實國防；國防一有了把握，聯英以抗共同敵人，自然不會成問題。然就歐洲形勢上看，英國爲防禦德義進攻計，勢不得不集中海軍於北大西洋及地中海，這種需要在失掉法海軍協助後，似乎尤爲急迫。這樣情形之下，德義或許乘英海軍力之分散，設法在南大西洋切斷英國與南美間的交通，甚至將要侵入拉丁美洲。當然這個企圖此時很不可能，不過，高一英國海權失勢，德義或難保不出此一着。針對着這一憂慮，美國除維持英國海軍力之外，事實上還須建造「無匹」的海軍，以爭取大西洋上的優勢。這點我認爲十分重要。

在大西洋方面，助英是美國自衛的措置；而其對太平洋的關注，實際更爲深功。美國在太平洋的處境，和英略有不同，前者在那裏有重要海軍根據地，後者則只有一個無防衛的香港。英國的遠東第一防線，是在新加坡，而不在太平洋；日寇在海上有一齣動，美國便首當其衝，照理應該早爲之備。照前日寇進兵贛武，對華加緊侵略，使太平洋形勢險惡，或有甚於大西洋者。在此情形之下，美國的態度，實爲全局之關鍵；倘肯趁機助華制日，則侵略主義終久要失勢。在太平洋方面，中美英的共同敵人，無疑的是日寇。日寇的國策是要乘歐洲擾亂之時，一面企圖消滅中國生存，一面極力排除英美勢力，然後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此次中國抗日之戰，不啻是反侵略的前哨戰，使日寇精疲力竭，不能再作獨霸東亞的好夢。就利害上言，美國助華制日，固然是助人，同時亦是助己；而我國對美國抱着較大的期待，自然也是以互惠共利爲前提的。

近來美國對日，益趨強硬，並非虛張聲勢，確已證之於實際行動。美政府除決對日加緊禁運外，又予中國以巨額新借款，甚至表示準備在太平洋作戰。援華與制日，本是一件事的兩面；美國竭力支持中國之抗戰，其制日的

作用最劇烈的。色厲內存的日寇，鑒於美國政策之急變，知大禍無可或免，於是妄想以外交手段，對美企求緩和。去年十月間，歐四相會開緊急會議，商定對英美對策，其決議的要旨，即在謀與美國妥協，俾得自脫於窘境。不久以前，野村受命使美，松岡發表談話，都是日寇媚美的重要步驟。就日寇國內而論，那一個不畏懼對美作戰，而亟盼德國在歐洲勝利之後，可使國際形勢轉與日方有利，或可迫使美國自動退出遠東，是故美國儘管在經濟上加緊制裁，日寇等不得不暫時忍受，以靜待時機之來臨。日寇對美外交，實際上是一場騙局，不管怎樣拉攏，怎樣送禮，都難以遮蓋敬視美國的事實。在現今情形之下，美國最有力的表示，莫過於以積極援華，答覆日寇的妄想。

美政府的新遠東政策，大致可視為民意的反映。輿論在美國政治上是比較有力的，平時政府受輿論的牽掣，凡須先得民意，總敢放胆進行。這固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但輿論的方向恆難逆測，每使當局決策定計頗感掣肘。本來美國國內即有非干涉主義，流行於輿論界及政界，其潛在的影響頗大。我們曾引為警惕的，素來反侵略持正義的人，其中也有抱這種主張最出力者。他立論太激烈之太過，以為今日歐戰所加於美國安全的威脅，實際遠較於日寇為大，所以倡導暫時對日妥協，以專事反抗德義，俾使美國得集中全力於大西洋。此說之悖理，過去不少美國人未必認得清楚，我們此時不妨再加指點。

輿論謬誤的產生，雖未必能左右政府的外交政策，但其所根據的兩種完全錯誤的假定，此時不得不加以推翻：第一，主此說者妄想對日暫時退讓，可免軍事間接之危險，而不想該國根本是缺乏理智的蠻武者，非至碰壁觸礁，絕不會回頭止步的。第二，此說主張分區遏抑侵略，先鎮歐洲再顧到東亞；而不思歐戰爆發，始終結成一體，欲分別應付是不可能的。這兩種誤解索繞人心，乃乖謬的外交謬論之所由生。過去張伯倫與達拉第，就是受這些誤解所迷惑，造成今日歐洲的空前浩劫，到今適足為美國人的殷鑒。妥協在侵略者的心目中，總有怯懦的表示，況且以往民治國家委曲求全，那一次不是一面獲得弱者的利益，一面又徒助長蠻武者的野心？歐戰發生後，英國會兩次對日屈服，其結果究竟如何，已為世人所俱見。現在英國竊破了日寇的迷夢，決計拋棄傳統的姑息政策，從此制日當不再長意退縮，以免自誤誤人。

去年十月間，英政府不顧日寇的要求，毅然開拔黑爾公使，是英國在外交上雖然改圖的明證。英國在歐洲正從事反侵略之戰，東西忽東，顧此失彼，或有其苦衷；但美國處境與英完全不同，在歐亞兩洲均不受到任何直接威脅，初不必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坐令侵略日益放肆。最近羅斯福總統在歷次演詞中，對於歐亞兩洲，一律相提並論，這足以證明其無意於一個抗侵略，而在另一隅實行姑息政策。基於這個認識，我們始終認定美國外的新動態，是今後國際政治的一大轉捩。

自七七事變以後，美國在遠東所玩弄的，是消極的外交，祇管口頭而不動手。她替自己的辯護，不外是海軍力還不充足，難於重洋遠征；現在雖已始建造「兩洋海軍」，但完成尚須等待相當時間。其實這也是一種過慮。我們敢信美國此時倘以現有的海軍力應付日寇，大體不至感到什麼重大困難。在太平洋方面，最要緊的還是早作先發制人的準備，如借用新加坡，加緊美澳聯防，及防衛香港菲島等根據地。日寇經過了三年餘侵華，既感力竭精疲，如再冒險南進，自不堪美國之一擊。依此情勢觀測，美國制日絲毫無過慮的理由。現世弱小的國家，那一個不願過制侵略，但祇嫌其力量不足；而美國以經濟之充裕，軍備之強大，及處境之優越，領導制暴扶弱，是各國中最有資格的。但以往她常以力薄為藉口，祇聞高喊制日，未見速定計劃，下決心，真可謂一力有餘而心不足。力量是相對的觀念，必須由於國與國間的接觸，摩擦和鬥爭才能表現出來。所以美日間強弱的懸殊，實際上須至直接交綏之日始可暴露。美國向一味計較力量，在嚴重的關頭，不敢堅決作戰，其制日的政策恐難於貫徹了。日寇向來想利用美國人的畏戰心理，屢次以戰爭相恫嚇，但現在這種慣技已不適用了，美國人既知日寇處境窮蹙，當不再以力量不足為慮。這點我們看得很清楚的。

在遠東，現在是美國領導，英國跟隨，蘇聯又居其後。美國站在反侵略陣線上，助英當不忘制日。今日日寇，已成德義的幫兇，三國沆瀣一氣，聲息相通；去年三國同盟的簽訂，表面上是對英國的挑釁行動，實際則其對美國，威脅的意義居多。由此而論，助英與制日，俱是美國自衛的措施。二者應兼顧並重，不宜有所偏廢。時至今日，為了日寇野心之日益顯明，為了我國抗戰之愈趨有望，美國對日援華，應下最大的決心，絲毫不容躊躇猶豫。

黨治與法治

樓邦彥

「黨治」與「法治」雖然都是我們熟聽了的名詞，可是一般人却不一定對於這兩個名詞具有正確的觀念，而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更少加以注意。讓我們首先來解釋黨治的意義。這裏所謂黨治當然是指政黨而言，政黨原是西洋政治進步的國家中的一種制度，所以爲要明瞭黨治之意義，恐非在相當的西洋政治名詞中，求之不可。黨治應就是指 Party Politics，可譯爲政黨政治，惟有在明白政黨政治之含義後，我們才同時確定了甚麼是黨治。也許有人認爲我們應該拿「以黨治國」來解釋黨治，因爲解釋實在通俗簡明，而「以黨治國」恰恰是一個現成的成語，不過正因爲「以黨治國」已經成爲一個成語，一個成語是往往有它的傳統的意義的，「以黨治國」的傳統的意義使我們不能拿它來說明黨治是甚麼。依照傳統的用法，「以黨治國」是指以一個特定的政黨，排斥異黨，無限期地來治理國家而言，這非但與政黨政治的基本精神相違背，即與政黨本身的意義也是相衝突的。所以單就字面言，「以黨治國」並非無可取之處，不過爲了它有它的傳統的含義，我就不主張因辭害義地拿它來解釋黨治。那麼政黨政治究竟作何解呢？簡單的說，兩個以上的政黨以和平競爭的方法謀奪取政權的目的，這就是政黨政治。所以政黨政治一定是假定有兩個以上的政黨之合法的存在。「黨」的英文是 Party，法文是 Partis，德文是 Partei，都包含「部份」的意思，此可見黨是一部份人的組織，在這一部份人的組織以外一定還有其他一個或幾個代表一部份人的組織。我曾經偶然翻了一下手邊的一本牛津簡明字典，它對於 Party 一字的一個解釋是「一個對於公共問題組成各種派別的制度」(System of taking Sides on public questions)，這也是一個證明如果有黨一定是不止一個的。所以我們要是採取一種嚴格的說法，一個不容許反對政黨之合法存在的國家非但沒有實行政黨政治，即獨霸政權的那一個集團(如如之國社黨，義之法西斯黨，蘇俄之共產黨等)也根本上是一個政黨。總之，所謂政黨也者，它的存在目的是奪取政權，而與其他政黨共同採取和平理智的方法，在某一個時期內去競爭獲得大部份人民的擁護。政黨政治的精神是在於此，黨治的意義亦如是而已。

其次，我們再來看一看法治的意義，這是一個很大的也是相當複雜的問題。這裏我們祇能加以概括的說明。所謂法治就是守法，守法在不同的情形下可以有積極的或消極的意義。有的時候，所謂守法是指法律上的權利義務主體的活動皆須積極地依據法，又有的時候，所謂守法也可以指一切行爲之消極地不違反法，不過法律之規定活動的根據或行爲之禁止祇是法治的靜態一方面而已，法治還有它的動態一方面，這就是說，應依據法的活動而不依據法時，或不應爲而竟爲違反法律的行爲時，一定要繼之以制裁，因爲要是沒有制裁或有制裁的規定，而不能執行的話，則法律無論怎樣詳盡，至多也不過是不發生作用的具文罷了。法可以規定政府與人民的活動的根據或不應爲的行爲，但對於違法行爲之是否加以制裁則全要看政府尊重法治之程度。抑又有進者，法治與制裁並不發生絕對的關係。凡是成爲法的不一定都是良法，法之良與不良絕不因制裁之好壞而定；一般的人民之知識經驗與興趣總是很有限的，他們不一定有能力或有意去對法的内容加以評斷，可是他們却又是理智的動物，在普通的情形下他們不致於會妄信制法者所公開宣示的善良的動機，他們所斤斤較量的祇是形式上的制法者人選和形式上的制法程序，誰制法和怎麼制法恐怕是最主要的因素。確定人民對於政府和一般的法律的態度，換言之，法之究竟良與不良是全看人民對於客觀的公法關係之忍許 (acquiescence) 與否而定的。所以對於違法的行爲加以制裁，是不一定絕對能發生法治之結果的，因爲人民要是在某種情形下不遵守不良的法，或竟致趨於極端而引引起暴動革命等情事，人民固無咎也，其咎乃在制法時之不合乎法治的原則；在這種情形之下，制裁非但不能構成法治，實際上就是專制暴政。

根據上面所說的，黨治與法治有一個根本相同的地方，它們都是都以理智爲基礎的。黨治與理智的關係甚爲明顯，因爲第一，黨治是假定兩個以上的政黨之存在，人民可以隨時選擇他們所屬之政黨，或選擇理智護任何一政黨之政策；第二，在黨治之下，各政黨的目的雖都在奪取政權，然而絕不以武力來決勝負，它們所參與的是一個和平的政體，以理智的方法來獲取

某一時人民理智所決定的擁護。法治之理智的基礎也是同樣的顯而易見。一方面，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法治的條件是人民對於客觀的公法關係之忍許，換言之，活動所根據的法律，或規定禁止行爲的法律，如果不是理智之產物的話，法治的先決條件便難以成立。另一方面，制裁雖然是完成法治的要素，但制裁不是一種一智的行爲，則法治仍舊是功虧一簣。明白了法治與法治是都以理智爲基礎以後，請進而言法治與法規的關係。

法治與法治是互爲因果的兩個制度，無法治則不足以言法治，無法治則不足以談法治。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祇有兩種可能的情形：或則一個人或一派勢力把持一國之大權，一意孤行地決定法律之內容，近今的獨裁國家和軍閥國家即其例子；或則一個國家尙呈割據的局面，割據者在各地各行其是，魚肉人民，既不以爲理智行爲之標準，當然是談不到統一的法律，這一種的例子，我們也是很容易找到的。如果沒有法治，則在政治中便不成爲重要的因素，權力的基礎或維持權力的手段也因此常常是武力與恐怖，在這種情形下，法治當然是不容許存在的。要兩個以上的政黨都有相等的機會去取得政權，而用的又是和平的方法，互相批評反對，彼此攻擊排別，最後讓人民自動地選擇智來判定政戰之勝負，這究竟是需要合適的客觀場合的，這合適的客觀場合就是法治制度。祇有在法治制度之下，兩個以上的政黨才能有合法的存在，祇要在不妨害國家之根本制度的範圍內，每一個政黨都有不能剝奪的生存權，每一個政黨都有權要求與其他的政黨有相同的法律地位。祇有在法治制度之下，多數的政黨才有可能以和平的手段來奪取政權，一方面在朝攝政之權的政黨必允許異黨的存在，另一方面在野反對政黨的政黨，必思以理智的方法去變換人民的信心，這是由於法治使得各政黨不採取任何和平以外的手段，也祇有在法治制度之下，人民才能够選擇智選擇組成政府的政黨，人民對於政戰勝負之判定也才能得到最公正的結果。於此可見，要求法治而不主張法治殆爲徒然的努力。

試進一步再來看爲甚麼法治又是法治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我們已經知道了法治的意義及其成立的條件，我們也就不難推想沒有法治的時候的情形。在一個否認法治的國家內，最近二十年的世界政治史告訴我們，往往有由一個人所領導的集團在把持着一國的大權，這個集團總是擁有政黨之名（雖然在邏輯上是有毛病的），我們從前有一位要人曾經說過這麼一句名言，一

「黨內無黨，黨外無黨」，這句名言恐怕最能够道出這一類沒有法治的國家的特色。在黨治之下，所有的政治一定都是民治的政黨，一個民治的政黨的條件，是黨內的關係之受制於民治原則；黨的紀律固然是維持的，可是黨的首領不一定要成爲黨員盲目崇拜的偶像，黨員在本黨以內必須有自由表示意見的權，黨的政策行動不是一個人所獨斷的，而是黨的組成份子自由討論的結果。根據這一點而我們要是採取一個較寬泛的說法，則一個民治的政黨在本黨以內未嘗不能容納不同意見的派別之存在。譬如在這一時期以後，英國勞工黨內有少數很重要的份子主張由勞工黨與動組織一個與國民內閣對峙的聯合組織（A United Opposition to the Chamberlain Government）以期於大選時推翻張伯倫所領導的國民內閣，他們屢次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組織聯合戰線的議案，然均爲拒絕，可是他們還是繼續主張。繼續批評本黨傳統的政策，而勞工黨則始終遵守民治的原則，從未加以阻止。一直到勞工黨領袖 Sir Stafford Cripps（主張組織聯合戰線之最激烈者）在黨外的活動對於黨的前途有絕對不利的時候，方請決將他革除勞工黨黨員籍。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在不違反黨的紀律範圍內，一個民治的政黨是可以並且應該容納不同的意見或不同的派別之存在的。一個民治的政黨的條件，是本黨與其他政黨的關係之受制於民治的原則，這就是說它決不排斥異黨而將政權永久地擁爲己有，它認爲政權之誰應以民意爲轉移，乃與其他的政黨共同作公開的，和平的，理智的競爭，讓勝負之決定全操諸人民之手。最近美國的總統競選已有結果，我們除掉祝賀羅斯福總統成功外，還應該去體會競選時的那種和平活躍的空氣，那麼我們同時也會知道羨慕黨治之可貴了，凡是在黨內不容許派別之存在的政黨，它一定有一個必然的趨勢排斥黨外的異黨，反之，凡是排斥異黨的也一定不容許黨內有派，這兩種情形是互爲因果的。換句話說，黨內有民治，則黨外方有民治的可能，黨外無民治，則黨內亦必無民治。所以一個國家要是不實行黨治，要是主張「黨內無派，黨外無黨」，則民治不過是裝飾門面的號牌而已，法治也祇是成爲一個矛盾的名詞。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德意志未嘗沒有法，也未嘗沒有制裁，然而誰能辯護說德意志尙有法治制度的存在呢？有法有制裁，而尙不足以滿足法治的條件，那是純因爲沒有黨治的缘故，所以在沒有黨治的情形下，法治是絕對不可能建立起來的一種制度。

我再重複的說，「黨治」與「法治」早已成爲很普通的名詞，不過不幸的是多少很普通的名詞常常爲人所誤解，多少似平常而實不平常的事情常常不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本文祇是簡單地對於「黨治」與「法治」加以解

日本的南進

日本大陸政策的實現，其入手之點，總脫不了三個途徑：一先取西伯利亞，消滅蘇俄在亞陸的勢力，然後佔據蒙古的故事，步步南進，以掩蓋亞細亞的全部；二先取中國以增厚實力，然後向北並進，以完成其大陸政策；三爲先取南洋各島，取南洋各島在東方前根據地，然後俟機而動，或先攻蘇，或先吞中國，依次而完成一統亞陸的大業。日本自明治維新以至一九三七的七十年中，毫無日不在考慮這三大計的得失之中，而第一與第二兩途徑之執意執着爭論的焦點。九一八與七七之間相隔達六年之久，其所以然，亦大半因先攻蘇聯在中國，與先平中國後攻蘇聯之爭，始終沒有解決。如果中國實力的增加不如七七前三數年之速，日本或者還是不能有所抉擇。中國進步之速，逼迫日本採取了第二途徑，而有三年未決的中日大戰。但自七七以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的蘇德協定，在這二年多中，日本並未完全忘情於第一途徑。當攻蘇不勝之時，日本也常思及攻蘇的途徑。日蘇關係之所以久呈緊張狀態者，蓋即在此。

三大途徑中，南進的主張一向是潛伏而不顯。蓋南進需要海軍。日本的海軍對世界大勢向來要比陸軍及政客多些認識。南進政策的主要對象爲英國。日本海軍對英國又素具敬意。所以在理論上，南進縱是一個好途徑，但在海軍對英敬意沒有消失的期間，南進的實行很少有人作準備；在其他途徑沒有絕望的期間，南進的必要更很少有人堅持。

最近一年半以來的形勢却不同了，在一方面，南進幾成了日本唯一沒有試過而或者可以取勝的途徑；在又一方面，不南進的理由則已漸漸減少。日本發現大陸政策的三途徑中，攻蘇之路已證明了不通，攻蘇則因蘇無西顧之憂，無隙可乘，只有南進尚可一試。同時，英國比年對付侵略的政策，本意而又盡，去年五六月法國慘敗以後，其國運又是岌岌可危，無餘力以顧及遠東。在此情形之下，南進，至少在表面上，乃成爲最有希望的政策。

特別提出兩者間之關係的一點，這便是一個正名的工作或者能够幫助我們瞭解國內許多問題的癥結所在。

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四川嘉定

錢端升

但日人也並不輕視南進的困難。去年十月及十一月中，日人之所以竭其全力，以造作「和平」空氣，以引誘中國言「和平」者，其用意乃在使中國不戰而放棄和平其名而屈服是實的一和平」。如果誘和成功，則日本所獲者，仍是第二個途徑，即先平中國而南進。今誘和既失敗，武力滅我無可能，蘇聯更無懈可擊，於是南進遂成爲不得不試之路。

南進，如果成功，自然可有許多收穫。日本攻蘇，多年無成，其國際地位早已一落千丈。如果南進成功，則縱被其所敗者僅是英荷的殖民地，而不是英荷本國，但日本則仍可以勝英自詡。而且取得馬來半島之後，緬甸泰國俱可入日本的掌握，中國的西南可以被所包圍，對華軍事亦可易於進行。如就物資而言，則南進成功後，獲益更多。日本所必需的油及皮可以無缺；日本所需要的其他金屬，如鐵錫鎳鋅等，亦可有所供給。無論爲恢復國家的威望起見，或爲糧食接濟起見，或爲獲取物資起見，南進俱爲於日本有利之事。

但南進的困難至多。在軍略上，南進爲遠征。便有遠征的許多困難。南洋是英荷的殖民地，英荷的防禦力須一一擊破。中英美英的關係近日趨密切，如中英予英以援助，則南進的阻害更巨。今請將這些困難分述於後。

所謂南洋可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南洋只包含英屬馬來半島及荷屬東印度羣島。廣義的南洋則包含亞洲大陸南尖各國，荷屬東印度羣島，及菲律賓羣島在內。日本的野心是無限的；日本對非島，甚或澳洲，也具有野心。但在目前，則南進的直接對象僅在佔領或控制暹羅三國，馬來半島，及荷屬印度。要佔領或控制這些地域的全部，新加坡的奪取或毀滅不但有必要，而且是先決條件。新加坡是世界四大要塞之一，軍艦容量之大，與防禦工事之固，與直布羅陀，珍珠港，暨德之赫立高爾同名。縱英方防守新加坡的軍艦現時爲數無多，但此港一日在英國手中，及英國及其與國一日可以增厚駐在

該處的軍力，以威嚇附近的敵人。換言之，日本如不能佔領或毀滅新加坡，則他對南洋大部分的地域無從進攻；即偶可佔領一二地區，也不被英軍反攻的危險。

日本至現時為止，除了可以台灣為根據地外，台灣以南，只有海南島及海防在其手中。海防為一次要軍港。佔領海防，固可封鎖中國運出口線，但對南進大計，却不能發生多大幫助。海南島築港之事，近雖屢有傳說。但海南本無天然良港，即有相當可用之港，如使其成為良好根據地亦需時甚久。如以海南為根據地，而策動爭奪新加坡的戰事，最近期內殆無可能。基隆與新加坡之間，最佳的現成軍港，要推越南的金蘭。以我輩所知，日人至今尚未能佔用金蘭。即令越南法當局能拱手以金蘭西貢兩港讓日人，日人亦未必能利用之以攻擊新加坡。新加坡雖與金蘭近，而基隆與金蘭西貢遠，其間遠近約差一倍。日英一旦入作戰狀態，則日人所佔的金蘭西貢最易受新加坡的威脅，而日方的援軍則多半須遠由基隆開來。縱將不論英之香港與美之馬尼刺所發生的阻撓力，單就距離而論，日方固已處於極不利的地位。

日本如不由正面攻新加坡，不出基隆、海南、越南之線，以攻新加坡。而取側擊的方法，則其困難也不減少。太平洋中的加洛林羣島為日人的代管地，在耶普，在帕樂 (Palau)，日人皆建有秘密根據地。日人如由這些地方，西南向以入馬加塞 (Macassar) 海峽，則不難佔領波羅尼洲東岸的要地如塔拉甘 (Tarakon)，如白利班班 (Balipangpur) 以及色利皮斯島 (Celebes) 西岸的馬加塞。這三者均為馬加塞海峽的要地，也是產油之區。日人得此，即可滿都其一部分的需要。但日人軍事的行動決不能止於此；不進則退，日人不是向荷印主要軍港蘇拉白耶 (Surabaya) 前進，便將被荷印所擊退。蘇拉白耶在爪哇島的東南角，位於荷印的中心，荷人在此有軍港，有巡艦，有潛艇，有機場。日人如單由加洛林羣島出發，不由基隆出發，恐甚難派出足以對勝荷印的大軍。如由基隆出發，則又逃不了先佔新加坡的問題。所以以偏師由加洛林取馬加塞海峽之舉，很難有成功希望。

另一側面攻擊的辦法，是一面佔領越南泰國，一面假道雲南，以取緬甸，待佔了泰國之後，再待機以動，或以陸軍直搗新加坡，或另闢克拉 (Kra) 在泰國南端之運河，以便新加坡成為良港。以最近泰越衝突情形觀之，似泰國已入日本彀。但假道雲南以攻緬，日本無此能力。緬甸不入日手，則攻

新加坡的陸軍將隨處受緬甸及馬來陸空軍的威脅。至於開闢蘇運河，則更不可能。

日本要取新加坡，決不能假想新加坡是一孤立的靜止的根據地。新加坡不孤立。除了英人在馬來半島的陸海空軍外，荷印的陸海空軍也即是新加坡防禦力的一部分。新加坡也不孤立。除了南洋羣島的英荷武力外，緬甸印度陸空軍，澳洲陸海空軍，香港的成軍，美國在菲律賓的武力，及中國陸海空軍，也可為新加坡的聲援。此中，除了美國的援軍外，其餘均可無忌憚而開往日軍所逼之地。與日作戰。美國的武力固然不一定與日作戰，但日人又如何能防呢？

英荷所能在南洋集中，以抗日人的軍力，果然不易計算，但海軍亦不過隻約有二百，陸軍約有三十五萬，飛機約有七百。英荷未嘗印度及澳洲所能派出的援軍計算在內。這也未嘗將新加坡要塞的砲火力計算在內。日人如欲攻克新加坡，許多武力所集中的中心——新加坡——勢非以較大的武力從事不可。假如日方攻軍的總量須大於英荷守軍的數目一半，則日本須以三百艘艦，五十萬大軍，一千架飛機，組織遠征軍，才有獲勝希望。但日本何能有如此大軍？即使日本固有長期的準備，可抽如許大軍，但日本又何必必美國之不參加？更何能必美國之不於地中海調海軍，印度澳洲調陸空軍，以助戰？

所以如單從武力正面競爭而言，日本實難有取勝的把握。日本只有用「偷」之一法，巧奪時機，才有些須希望。論者謂希特勒一生的勝利皆對機會，皆因其獲得時機。自一九三五年佔萊因區，以至一九三九年大攻荷比法戰，希特勒每乘人之無備，或乘人之齟齬。日本如能善得時機，或當可擊破對方相當雄厚的準備。我們相信，日本如果於去年六月下旬南進，不稍顧忌，不稍遲疑，則南洋早已為日所有。但日人兇很有餘，而缺少冒險性，既未能乘機去攻英荷之機會，則此後或不能再有同樣的好機會。

英荷與美之鬥志，三美美國的轉趨孤立。英國慘敗的結果，必無法在華加坡增援，而美國所可給予英國的援助亦將集中於大西洋。中國喪失鬥志的結果，使日本的前進更無後顧之憂，假道雲南攻緬亦易成事實。美荷孤立的結果，可為日本除東顧之憂。有一於此，南進成功的可能性自可大增。但三者中，第三很少有可能性，不，討論。第二之是否發生，一要看日人其否能

努力抗敵。二要看團結是否鞏固。以過去推將來，前途固然渺茫。但如能知喪失鬥志的危險，而益圖奮勉，則其可能更廣。第一的可能是二二三爲大。但以半年來英國士氣民氣之盛，與今後美國助英之力，英國既敗於去年七月八月，又烏至敗於今後？是故日人如欲乘機而動，則機也誠不易得。讀者當傳日人本應與英人同時進攻南洋希臘。這本值不得認爲良機。且英人之敗北已使這所謂良機者消逝。真正良機更何從覓得呢？

日人的南進，如不俟良機，則荷印及其與國的實力有非日人所能制勝；如俟機而進，則又不知何日始有良機。日人宣傳南進已久，而迄未能進者，以此。日人在台灣，海南，中太平洋羣島，準備南進已久，而仍不南進者，也以此。然而，日人果敢發動南進者，則又不然。日人大陸政策總須求其實現，成功與失敗，二者必居其一。日人侵華三年餘，尚未成功。侵華既不能爲實現大陸政策的起點，而攻蘇又絕無可能，則南進仍須考慮。日人目下雖仍在待機會。等到久待不得機會，耐性消失之時，殆即日人盲目衝撞之時。到了那時，如果中英英荷能撲殺此獠，或者就是日人大陸政策最後失敗之日。這南進的困難也許會促使日人再度以全力攻華。國人於討論南進之時，不可不慎防此着。

本期撰者

本期五篇文章，三篇皆論國際時勢。張忠敏先生從羅斯福總統去年年底的「邊邊播講」，論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加強，並推及其今後的趨勢。王翰愚先生撰文在六月六日羅斯福向國會致詞之後，美國今後援助民主國的方式已很明確，故他更論及美國行動對於今日國際大勢的影響。錢端升先生討論日本南進的困難甚詳。因爲南進有困難，敵人或會再竭全力以攻我。事雖未必如此演變，防範却不得不週。潘光旦先生大學應工讀兼營的主張，是對症而發的。反復加以討論，容可發現它是一服良藥。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六九〇七號
 東南圖書審查會審查證警字第三三六號

本刊

第一卷 第一期

這一週
 民國三十年度的工作
 金融借款與金融政策
 勞工的社會地位
 論財產權與自由權
 敵僑在浙西的經濟侵略

伍啓元
 梁孝通
 林良桐
 張振華

一月二日

經濟學報

第一卷 第一期

消費者的剩餘
 因德芬斯曲線之意義與應用
 現階段農業建設之途徑
 克思經濟理論體系
 戰時資產建設問題
 物價問題的分析

潘源來
 胡寄聰
 吳文暉
 鍾慶
 王膺民
 王宜昌

中國文化服務社代售

今日評論

每星期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華山南路一六五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華山南路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二角 訂閱全年八元 半年四元 (香港以港幣計算)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 (或折成美金五元)